

俄罗斯重构东方

维克多·马拉霍夫斯基

近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它将欧洲视为亲人，但却被这个亲人视为应被消灭的异类。大胆揣测，造成这种悲剧式不对等关系的原因，并非俄罗斯“没有正确理解欧洲”，恰恰相反，正是俄罗斯对欧洲的理解过于准确，而没有顾及二者之间的差异。

敬爱的读者们，心理语言学档案中存有一系列关于十九世纪末东欧乡村通晓几种语言的村民的观察资料。这些村民，按理说，完全不识字，却往往把这些语言都当成母语，能流利地用它们交流。然而，如果让这些人翻译一句话，比如从德语翻译成罗马尼亚语，或者从斯洛伐克语翻译成匈牙利语，他们会绝望地低下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怎会有什么话要“翻译”。原因在于，在他们的世界中，每种语言里的每个短语都被硬塞进了语境中。对他们而言，甚至用德语和罗马尼亚语问别人借盐，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请求，第一种是向镇上的商人借盐，第二种是向篱笆墙对面的邻居借盐。

日本现代文化爱好者在与日本人交流时也出现相同的问题。日本人听他们说完后，嘿嘿笑着解释说，从动漫中学习日语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动漫中，每个角色讲得都是符合其性别、年龄和社会属性的一种杜撰的、修饰性的“假日语”。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多使用中立的客气话，而在动漫中听不到这些话。

由此可见，“翻译”能力要求我们具备已知的中性（或者抽象的）领域用语，在这一领域中，盐不再是罗马尼亚语的盐或德语的盐，而只是盐。

有时这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样的中性空间总是相当有限。例如，在匈牙利语中，“沼泽”一词仅指一种地形；在俄语中，沼泽意味着女妖出没之地，引申为忽视的潜在威胁；而在芬兰语中，“沼泽”一词与我们的“大地母亲”有类似的情感特征。

所有这些现象将我们引向一个问题：所谓的“文化对话”到底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话实际上始终是两种文化的彼此重构，并且它们相互理解的程度将取决于“我所想象的中国和中国人所想象的中国的冲突程度”。

诚然，我们众多博览群书的同胞都知道些中国经典著作（例如，他们曾经尝试研读某部古典小说）。然而，就连最好的译本，也只能让我们更接近于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理解，因此要说熟知中国经典著作，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中俄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当我们阅读经典著作的俄译本时，读到的内容至少有一半为译者的理解，以及他试图用类比来替代中国生活的实情。

要想让不同文化以某种方式达到相互理解，它们不仅需要长期相伴而居，还需要达到日常生活的同步化，且往往不仅是日常生活方面，还包括信奉的神灵。没有这种同步性，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相互理解。犹太人在威尼斯生活了几个世纪——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与意大利人进行宗教辩论；然而，争论之久表明其徒劳无效。双方各执一词，不可译的神圣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个体的、他者无法替代的经验。

其实，这种精神层面共识的缺乏并不妨碍日常生活层面的同步化：私情、艳诗、金钱和性自由渗透到犹太人居住区的四周。渐渐地，犹太人居住区周遭文化侵染。结果是经过约七百年，就连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也没觉察出意大利籍犹太人有何异样，而犹太人自身意大利化程度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曾在天主教朋友家躲避德国人的罗马首席拉比，战后与家人一起皈依基督教，从而引发了一桩巨大丑闻。

这告诉我们，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仍是可能的，只要它们的日常生活结构趋于同步。

重点在于，有些同步无需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例如，人类担心杀虫剂对蜜蜂造成危害，却完全不必变成蜜蜂：对于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自然要素而言，只要不滥用对其有灭绝风险的化学杀虫剂足矣。

目的是学习些经验，比如，向中国学习，不是一定要成为中国。由几代东方学家和哲学家形成的俄版“中国经验”，经过他们一再解读和反思，且检验适用于俄罗斯，那么即便与原版中国经验不尽相同也无妨。

再多说一点，切忌照搬照抄原版经验。因为中国经验只适用于中国，如果中国决定建设与苏联社会主义不大相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在俄罗斯创立与中国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俄罗斯特色儒家学说”也无可非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的大众文化和翻译舶来的

“高级文化”的独特混合体，屡次面临同样的问题：她一次又一次发现，将欧洲视为亲人，而欧洲人却将其视为必须消灭的异类。

大胆猜测，造成这种悲剧式不对等关系的原因，并非俄罗斯“没有正确理解欧洲”，恰恰相反，正是俄罗斯对欧洲的理解过于准确，而没有顾及二者之间的差异。几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文主义者就误以为自己是欧洲人（这显然是愚蠢的），把欧洲人当成自己人（这显然同样愚蠢）。

但现在，这段持续了三百年的迷恋之情似乎正慢慢结束。

如今，我们正经历极具戏剧性且长期危机四伏的转折：事实再次表明，我们所幻想的亲人实际上并不承认我们的亲属关系，且渴望摧毁我们，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我们整个国家正与其分道扬镳。

自然而然地，我们看向东方。

鉴于此，我们当前需要考虑建构相互理解的细节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其中主要的会导致的结果就是，相互理解的概念语言现在是，且未来长期仍会是与东方共同的历史对手和竞争者的一一而非与敌人的一一概念语言。

然而，这一点并不值得过分夸大。日耳曼人统治时期曾成功对抗罗马帝国，并最终成功侵吞其西部地区，然而他们发现，事实是，部分日耳曼人迁居到现在法国的领土上，转而改说当地话，而在另一部分人则忠守日耳曼人的根基。

结果是，法国原住民和德国原住民之间的外交活动，是使用他们共同的宗教语言——拉丁语进行的。

现在，俄罗斯为一方，中国或东南亚为另一方，很幸运，双方没有全心全意热爱或深入理解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更简单。我们无须用共同的概念语言向众神祷告。我们当下及中期的战略任务要简单得多：不能被这个进步的、先进的和包容的世界所毁灭，它已将我们和东方均视为敌人，并判处我们在所谓的战略服从（慢性自杀）和快速灭亡之间做出抉择。

对于双方（我们和神秘的东方）来说，当前的历史性机遇在于，我们既无理由也无可能相互侵略。议程上所列的实质性内容更为具体，是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来描述的事物，诸如吨公里、半导体、小麦、石油、天然气、生活消费品、稀土金属和联合军事演习。

至于“东方的本质”，即从东方引进的、按俄式重构的智慧，这是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从中学习的最佳品质，是永不气馁的优良品质。

我们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力争“在二十世纪初取得一些重大成果”。